



24年过去，五个洋娃娃真的成了“中国通”

羊城晚报曾报道的这个西方家庭，以预见和坚持写下“扎根中国”指南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赵鹏 吴珊 陈辉 付怡
图/羊城晚报记者 邓鼎园 温泽广

在东莞，“老罗”一家算得上名人。2001年年底，《羊城晚报》头版登了一篇题为《五个洋娃娃齐齐返大陆读书》的报道。稿件配图中，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妈妈牵着“洋娃娃”们，走进东莞一所本地小学。那是罗家第一次被这座城市记住。

20多年过去，罗家又“出名”了。这回是因为小女儿阿菊（中文名罗雅莉，网名“阿菊Addy”）在视频《24年前，洋人登上羊城晚报》中讲述了自己一家在中国的故事。身为自媒体博主的阿菊，用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和粤语征服了众多网友，这条视频播放量达400多万，收获逾10万点赞、上万条留言。

在外人看来，这像是一个“圆满”故事的开头和结尾。但鲜有人知道，这一头一尾之间，并非坦途，而是这家人在陌生“海域”里，长达20多年的摸索航行。

一次面向未来的迁徙

在这份2001年12月20日的《羊城晚报》上，老罗一家报道的旁边，还有两则新闻引起记者注意：《广东今年GDP再报捷 首闯10000亿！》《中国代表移位正式座席 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出席世贸总理事会》。这两则新闻勾勒出了他们一家搬迁至东莞时的时代大背景。那一年，中国刚加入WTO，还首次主办了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；改革开放蹄疾步稳的广东，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元。

当时，阿菊的父亲罗德基在香港有份不错的财务工作，生活安稳。当他决意带着整个家庭——妻子美沙和五个4到10岁的孩子——迁往“一河之隔”的广东，身边的同事、朋友无一

理解。

“我觉得中国内地正走上坡路。在内地，机会更多。”那时，老罗常因工作去上海出差，亲眼看着满街的自行车在几年间换成了川流不息的汽车，“变化快得让人兴奋，我想成为这变化的一部分”。

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，是对孩子成长的期望。老罗尽管在美国长大，但因德国家庭背景，许多生活习惯仍是德式的。他不想孩子们和他一样，而是真正成为跨文化的“中国通”，真正融入中国人的“圈子”。妻子美沙相信丈夫的判断。“我们第一次来东莞就爱上了这里。”美沙说。

于是，他们在东莞一个新建的小区买了房，街对面就有一所不错的小学。2001年，三个金发碧眼的孩子背着书包，走进了全是黑头发同学的教学楼（另外两个孩子上幼儿园）。这个画面被记者捕捉下来，登在了报纸上。

这篇24年前的报道，记录了老罗夫妇



阿菊拿着父母珍藏了24年的《羊城晚报》。刊于2001年12月20日的这份报纸，头版头条为《在东莞的一对美国夫妇有个心愿：让孩子接受中国教育成为“中国通”》五个洋娃娃齐齐返大陆读书。

当时的想法：“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五个孩子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，写一手漂亮的中国字，最终成为‘中国通’。我们的孩子将是中西方教育的完美结合。”

一份跨越经验的守望

这份坚持的重量，美沙体会最深。家长会，是她的“难关”。最初，班主任的话她一句听不懂，只能靠身边的孩子压低声音、零星地翻译几句要点。听着周围陌生的语言，看着黑板上不解的文字，她感到一阵巨大的挫败感，甚至曾悄悄抹过眼泪。

更大的挑战在于，她需要重新学习如何当“妈妈”。中美文化不同，教育方式相异，“我不能总是跳起来说‘我们美国不是这样的’”。从最初的困惑，到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适应甚至如鱼得水，她的想法慢慢发生了转变。

改变的不仅是观念，还有生活里细小的习惯。孩子们放学回来想吃“排骨”，她兴致勃勃烤了美式肋排，孩子们却摇头，说想吃的是中式排骨。那一刻的“错位”，让她明白，孩子们正在一个她不完全了解的世界里成长。

老罗管这叫“放手”。阿菊的比喻更形象：“我爸妈做的决定，就像把五个小孩直接扔进了中国的‘海洋’里。他们只在岸边看着，最多扔个救生圈下来，我们得自己扑腾着学会游泳。”

阿菊直到长大后才真正明白，父母那份看似淡定的“放手”，背后有着怎样的牵挂。“他们其实一直提着心，只是后来看到我们‘游’得还不错，担心才慢慢放下，也才真正看懂，我们接受的这套教育，原来扎实有用。”阿菊感慨，父母在孩子成长的岁月里，要放下自己的全部经验，去相信一个陌生的系统，并且十几二十年如一日

地，不怀疑这个选择，绝非易事。

一种无需翻译的懂得

孩子们这堂成长的“游泳课”，始于入校第一天。“几乎所有楼层的人都爬到栏杆边看我们，”阿菊回忆，“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。”

冰，逐渐被同学们的好奇和善意融化。学校食堂里，总有人大着胆子过来问：“我能和你们一起坐吗？”友谊，就从饭桌上的聊天开始了。

20多年过去，阿菊还记得好朋友家的座机号码。她们一起挤过公交车，一起把每周50元零花钱合起来，计划怎么花。朋友的父母，成了她在中国的“干爸”“干妈”。“我在国外的亲戚，反而像陌生人；但这里的‘家里人’，是陪我长大的。”阿菊用粤语说道。

对美沙来说，所有磨合的酸涩，在一个最普通的清晨被彻底化解。那天，她去学校，看到孩子们在操场和全校数百人一起做课间操。

“我一下子哭了，”美沙说着，眼眶又有点红，“我看着他们，动作那么自然，和身边每一个同学都一样。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节奏，完全融进去了。”

“融进去”——这个词她用得精准。那不是简单的“模仿”，而是几个孩子的呼吸、节拍乃至心神都与中国孩子们融为一体。那一刻，广播操的旋律俨然成了无需翻译的通用语。

餐饮行业，曾受聘赴克罗地亚打理一家餐厅，但因更喜欢在华生活，回到东莞开了一家酒吧。老三罗惠莉和最小的阿菊则都做起了自媒体博主。阿菊在B站、微信视频号、小红书等平台开设了“阿菊Addy”账号，分享一个从小在中国长大的“老外”的日常，全网粉丝量接近100万。

除此之外，五个孩子也是父亲生意上最好的“翻译”和参谋。美沙也终于卸下了照料家庭的重担，和几位中国牌友成了“麻将搭子”。

那份让一家人第一次“出名”的《羊城晚报》，被老罗一家珍藏着。“这份报纸对我们家来说像一份证明，证明我爸妈当年所作决定是正确的。”阿菊说。

今年9月，阿菊和姐姐罗惠莉一起回了趟美国，姐妹俩拍了一条《勇闯纽约》短片。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热闹非凡：“两个老广勇闯纽约！”“你们表里不一，外表美国人，内里纯中国人！”诸如此类的调侃比比皆是，阿菊看得津津有味。这些玩笑，恰是对她身份认同最温柔的认证。

日常生活中，当被问到是哪里人时，阿菊的回答没有犹豫：“我爸德国人，我妈美国人，但我在中国长大。这里就是我的根。”

从2001年到2025年，世界变了，中国变了，广东变了，罗家也变了。当年那个“反常”的选择，在今天看来却像一则精准的预言。他们不仅完整见证了成为中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也见证了广东从“世界工厂”到创新高地的蜕变、全省GDP从1万亿元到14万亿元的跃升。他们用亲身经历证明，最成功的“中国通”，不仅会说流利的中文，更能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把根扎下去，让生命长出独特的形状。

20多年，扎根中国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。对老罗一家而言，个中秘诀藏在阿菊流利地道的普通话和粤语中，藏在美沙熟练的洗牌声里，也藏在老罗坚定的选择中。

一场历时24载的扎根

20多年，足以让一株幼苗扎根，长成参天大树。

老罗夫妇当年的选择与坚持有了回报：五个孩子，两个上了厦门大学，三个读了中山大学。如今，除老大罗云妮在新加坡工作外，其他四个孩子都留在中国发展。老二罗曼莉在深圳的一家幼儿园做英文教师。老四罗杰信从事

教育焦虑弥漫之下，罗家的故事是一面镜子

记者手记

这是一份承载着时光重量的报纸。纸页微黄，平整得没有一条多余折痕。当阿菊小心翼翼展开这份珍藏了24年的《羊城晚报》时，作为当年报道者之一的我，心潮翻涌。

2001年，我24岁，刚褪去学生气，懵懵懂懂跟着前辈去采访，笔下还是青涩印记。岁月流转，当年照片里古灵精怪的小丫头阿菊，如今竟与我当年的年纪相仿。再相逢，她落落大方地站在我面前，眉眼间既有西方式的明朗，又透着东方人的温润。那一刻，时光仿佛折叠，有种亦真亦幻的穿越感。

这些年，媒体格局天翻地覆，许多同行转身离场，但总有一些时刻，让我庆幸自己还坚守在这个职业里——那些走进人心深处、记录家庭悲欢、见证时代如何改写普通人命运的瞬间，是这份职业永不褪色的魅力。

阿菊轻车熟路地领着我们走进她住了近20年的家园，看到熟悉的窗口便热切地介绍起来：“那是我干妈家，那是我闺蜜家。”这个东莞小区早已是她生命的一部分。和不少中国父母一样，如今，

老罗和美沙也不可避免地成了“空巢老人”。但他们的日子并不空落——收养流浪猫狗、收藏中国手表、与街坊一起打麻将、参加当地的辣椒酱制作比赛……这对夫妇用20余年时间，把自己活成了地道的东莞居民。

聊起孩子们的成长，这对夫妇的教育哲学，在当下这个普遍“内卷”、分数至上的语境里，如同一股清流，澄明而坚定。他们希望孩子成为“中国通”，不只会听说读写，更能理解中国文化的肌理与温度。他们欣赏中国式教育为孩子们打下的坚实根基，也跳出应试教育的框框——不强调标准答案，更在意独立思考；不盯着分数，而是守护好奇心；不在意大学排名，更珍视大学作为孩子第一次真正独立、为自己负责的起点……

谈及孩子们的现状，普拉提老师、酒吧主理人、幼儿园教师、自媒体达人……这些或许并非世俗意义上的“成功标配”，但美沙言语间满是欣赏与骄傲。因为她看到的，是每个孩子都活出了自己生命的成色：有热爱，有方向，有根有源，有底气对自己的选择负责。

在老罗看来，父母不应该为孩子预设轨道，而是要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坐标。这份“成全”本身，便是最好的言传身教。客厅最醒目的位置，老罗在辣椒酱制作比赛中赢回的一块块奖牌，与孩子们成长的印记摆在一起，共同讲述着一家人各自追寻热爱、共同成长的故事。

24年前，当留学潮汹涌，他们是“逆行者”；今天，当教育焦虑弥漫，他们的故事依然是一面镜子。

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

致读者诸君

在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系统性变革全面启动之际，羊城晚报常态化开展“寻找当年的你”活动，征集读者用户与羊城晚报的情缘故事线索。您可以通过羊城派客户端“记者帮”报料，或私信羊城晚报微博号、羊城晚报微信公众号提供宝贵线索、讲述动人故事。

南粤最美职工郑秋桦：

从一株兰花种苗到千万富民产业

南粤最美职工

总策划/温文星 任天阳 林海利
策划/袁子雅 林洁
统筹/姚文军 董柳
执行统筹/刘雪晴 侯梦菲
文/图 柳卓楠



郑秋桦(左三)在兰花基地指导学生 受访者供图

在粤北韶关，有这样一位“育花人”：他是三尺讲台上的教师，带领学生走进“花花世界”；他是实验室里的“植物医生”，育兰20载，解决蝴蝶兰行业难题，培育产值超3000万元的兰花产业；他还是田间地头的引路人，把实验室建在乡村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。

他，就是广东省劳动模范、南粤最美职工、韶关学院生物与农业学院的教师郑秋桦。从一粒种子到千万产业，郑秋桦以科技之光照亮乡村振兴之路。日前，记者奔赴韶关，与郑秋桦一同走进实验室、育苗基地、田间地头，记录这位“育花人”的奋斗故事。

核心技术不能受制于人

“这个玻璃罐子里有100多株兰花幼苗。培育长大后，一株兰花的批发价是20多元。你手上这一瓶就值2000多元……”走进韶关学院生物与农业学院实验室，一排排架上摆满了透明玻璃罐，瓶中乌黑色的养液上生长着一簇簇绿色的兰花幼苗，如同一个微型的植物世界。

这是郑秋桦的“兰花乐园”。看似普通的瓶瓶罐罐背后，藏着价值千万的富民产业，更浓缩了他过去20余载育兰之路。

郑秋桦大学毕业后，曾在北京一家台湾兰花企业实习。“当时韶关还没有兰花产业，我在实习期间发现兰花产业有很大的经济前景。回来之后，我就打算做这个研究。”在韶关学院，郑秋桦组建了全国高校唯一——个专注蝴蝶兰产业研究和转化的团队，并建立了蝴蝶

兰“植物工厂”实验教学工作坊。

“传统兰花种植太难了，病毒感染率超90%，成苗率不足70%，高端种苗30%靠进口。这些都是蝴蝶兰本土化、产业化发展的难题。”为此，郑秋桦带领学生潜心钻研，对准产业痛点进行科技攻关。

针对“病毒苗多”问题，他们研发的“蝴蝶兰脱毒苗培养法”，使脱毒率达到100%；针对“幼苗烂根”难题，他们自主研发的透气培养盆，将幼苗成活率从70%提升至95%；针对蝴蝶兰“催花慢、卖期短”问题，他们研发了“四位一体控花技术”，使催花期从40天缩到20天，并让销售期延长了2-3个月。

20多年来，郑秋桦带领团队成功解决了蝴蝶兰产业痛点，掌握了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，还培育出35个新品种，获授权发明、实用新型专利8项。

“如果不掌握技术，只是拿别人的种苗来养殖、销售，这对产业化发展是很不利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自主培育，这样才能实现源头自主可控。搞科研，一定要自主掌握知识产权，不能受制于人。”郑秋桦说。

科研成果赋能乡村振兴

“有了好技术，怎么让它扎根乡村？”在兰花科研之外，郑秋桦也十分注重兰花产业化发展，尤其是用科研成果赋能乡村振兴。

走进韶关南雄市珠坑镇梅关村，村墙上绘制了兰花和诗词，村中随处可见兰花的身影。韶兰(南雄)种

育中心就坐落在村口，被青山云雾包围，一幅美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。

郑秋桦介绍，去年，由院校、政府、企业三方联合投入600万元打造的韶兰(南雄)种苗培育中心正式落地。目前，基地年产360万株蝴蝶兰幼苗，带动超30户农户就业，帮助梅关村村集体年收入增加近30万元。

在种苗培育中心实验室里，记者见到了许多四五十岁的乡村阿姨们。她们穿着实验服，戴着手套、手拿镊子，正在进行蝴蝶兰无菌切苗。

“这些工作不难，郑老师给我们培训，很容易就上手了。我们这个年龄出去打工很难，现在在家门口上班，上班时有弹性，还能照顾家里，特别好。”梅关村村民肖水连笑着说，自己一个月最多能赚4000多元。

梅关村的发展是兰花富民的缩影。从一粒种子到千万产业，郑秋桦把小兰花变成了造福乡亲的“富民花”。如今，郑秋桦带领团队通过“院校+政府+企业+农户”联合，构建南雄、曲江、浈江、英德和赣州蝴蝶兰产业带，年销售额3000多万元，带动超1000户农户就业。韶关曲江石峰村和南雄梅关村因为兰花产业，分别入选了省“百千万工程”第一批和第三批“典型村”。

“最开始做兰花是看到其经济价值，后来是科研的坚守，现在可以说是责任。”郑秋桦说，当看到村民眼中流露出的感激和自信，他更坚定了科研赋能乡村振兴之路。“我要坚持下去，让更多乡村富起来，让更多农民富起来。”他说。